

当代工匠精神的淋漓阐释

——《决胜毫厘——大国工匠郑志明》的叙述特点和艺术特色

□ 杨仕芳(侗族)

《决胜毫厘——大国工匠郑志明》(以下简称《决胜毫厘》),是壮族女作家廖献红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洞察力,为读者展现了一位大国工匠郑志明的成长历程和闪光故事。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展现工匠精神、弘扬时代精神的励志之作。这不仅是对郑志明个人奋斗历程的赞美,更是对新时代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弘扬和传承,更让读者看到一个平凡人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业绩,感受到工匠精神的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

《决胜毫厘》以其独特的叙述手法和深入人心的内容,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大国工匠的鲜活形象,展现了当代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

在叙述视角上,廖献红采用了多元叙述的手法。作品不仅运用散文笔法,也运用小说构建手法,让读者能够深入描写郑志明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所思所感。廖献红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全面客观地展现了郑志明的生活、工作及成长历程。这种叙述视角使得作品既有主观

情感的细腻表达,又有客观事实的准确呈现,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在叙述节奏上,廖献红巧妙地运用了张弛有度的手法。在描述郑志明面临重大技术难题时,采用了紧凑有力的叙述节奏,使得读者能够感受到主人公的压力和挑战;而在叙述郑志明日常工作、生活场景时,则采用了舒缓自然的节奏,展现了工匠精神的平凡与伟大。这种叙述节奏的巧妙安排,使得作品既有高潮迭起,又有平淡见真,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

这部作品的叙述风格朴实自然,流畅有度,语言平实而富有力量。作者没有使用过多华丽的辞藻,而是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工匠的真实故事。这种叙述风格使得作品更加贴近读者的生活,让读者能够产生共鸣。同时,作品中也穿插了一些地方性的语言和文化元素,使得作品更具有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

作为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决胜毫厘》在保持其纪实性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强烈的文学性。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

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通过对郑志明个人成长和职业生涯的深入挖掘,展现了当代工匠精神的核心价值和时代意义。这种文学性与报告文学的有机结合,使得作品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在当下文学界,长篇报告文学因其真实性与深度分析而备受关注。廖献红的《决胜毫厘》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仅展现了郑志明这位大国工匠的传奇人生,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艺术特色。

作品对主人公郑志明的塑造堪称立体。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描述郑志明的工作和生活,而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展现了他的性格、情感和追求。在描述郑志明的生活场景时,作者不仅写了他的技艺精湛,更写了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和毅力,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长篇报告文学在叙事上往往面临如何把握节奏的问题。《决胜毫厘》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出色。作品既有对郑志明成长经历的娓娓道来,也有对关键事件的高潮描写,使整个叙事过

程既有节奏感又不失深度。廖献红在语言运用上非常讲究,整部作品语言流畅、准确,既不失文学性又不失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特别是在描述郑志明的生活场景时,作者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使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了工匠精神的魅力。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对郑志明个人的描述,更是对工匠精神、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度思考。作者通过郑志明的故事,向读者传达了对工匠精神的尊重和对中国制造业未来的期待,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作品在结构安排上非常巧妙,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将郑志明的成长经历、工作经历、家庭情感等多个方面巧妙地串联起来,使整个作品既有整体性又不失层次感。

总之,廖献红的《决胜毫厘》在人物塑造、叙事节奏、语言锤炼、人文关怀、结构安排和现实意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深刻的艺术特色。这部作品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大国工匠的传奇人生,更为我们提供了对工匠精神、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度思考和现实启示。

岑叶明散文印象

□ 李富庭(瑶族)

在我的印象里,岑叶明是多变的。他有时叫岑叶明,有时又叫叶明岑,经常让人分不清哪个是笔名,哪个是本名。他写诗,写科幻小说,也写散文,这令我略感惊讶。一方面是惊讶于他能够在三种文体间自由切换,纵横跳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散文真实展现了个人童年的种种不堪和隐藏在生活深处的乡村伦理逻辑。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内心,揭露乡村存在的问题,不避家丑、不遮自短,需要莫大的勇气。

就人与人的交往来说,构成乡村世界的关系主要有两组:一是亲族关系;二是邻里关系。岑叶明的散文《她已耄耋之年》以“我”的奶奶为中心,通过对一系列事件的描写,揭示乡村亲族、邻里关系的复杂性,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多元立体的乡村世界。伯父声明与奶奶断绝关系,却惦记她名下的土地。奶奶病重,伯父在亲戚面前装孝子,将她请到楼房里住,病好后又将其赶回旧房子。伯母纠集村中妇女编造奶奶的是非,大堂哥结婚时,又将作为长辈的奶奶请到家中,接受堂哥堂嫂的跪拜、敬茶,接待来客。这些虚伪的“面子工程”,因为没有足够的真诚、尊重与爱,变成了一场滑稽表演,不得不让人慨叹。而“我”的家庭境况也并不乐观:长期贫困,父母离异,父亲不务正业、沉迷赌博。

总体来说,“我”的生活是充满不幸的,最大的幸运就是得到了奶奶的疼爱,这是驱散生活阴霾的一道亮光。奶奶的文化水平不高,

却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教导:多读书、人穷就要被欺负、勤俭持家、隐忍宽容。这些道理简单朴素,但又充满了生活智慧。奶奶总是那么隐忍宽容,无论是面对儿子的不孝、孙子的叛逆,生活的贫穷困苦,还是面对死亡,她都显得那么坦然,“说到死亡,她的语气很平静,仿佛死亡和睡觉一样都是平常的事”,至多是叹气、抱怨、唠叨,或者“握着瘦小的拳头,时不时往自己大腿上捶一下”。虽然奶奶性格软弱,但不曾被贫困和疾病击垮,这种生命韧性来源于脚下厚实的大地,为“我”撑起了一片天空。作者一遍一遍穿越时空隧道,重返童年现场,一遍又一遍修改稿件,就是为了给奶奶“立传”。我期待岑叶明能在其他篇章中为更多的亲人“立传”,甚至包括虚情假意的伯父伯母和与父亲争吵不休的“老鼠”一家人,挖掘人物内心的隐秘,探寻矛盾产生的根源,作品将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岑叶明的其他散文作品,基本也是采用回忆叙事的手法,他沿着童年的江河逆流而上,用文学之网打捞水中的记忆。《原始食欲》写童年的食物记忆与窘迫的家庭生活。《父亲的前半生》讲述了父亲为生存四处奔忙的往事,揭示了父亲多重的矛盾性格与内心的孤独。《乐业往事》以幼年的残缺记忆和在乐业的生活经历为线索,追忆与外公交流的片段。《野蛮生长》写大学期间的青春往事,这段往事与爱情有关,也与文学有关。如果系统阅读这些作品,我们

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潜在的互文关系。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反复描写,固然能够呈现作者想表达的全貌,但是否也算一种自我重复?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作者太年轻、在有限的经历和记忆里,确实难以挖掘出更多的素材,更无法提供更多的观察视角。

作为90后作家,岑叶明对散文结构的设计和语言的运用,是值得肯定的。写回忆性散文,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成为“流水账”。岑叶明像是一位摄影师,善于利用镜头选取独特的切入点,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均有呈现,在巧妙的插叙倒叙和灵活转场中,塑造了散文的立体空间,避免了“流水账”问题。而在语言方面,用词颇为精准、句子短促有力,其中不乏对生活的理性观照和哲学思考。此外,岑叶明还在文章中融入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白话方言,奶奶“念叨了这个念叨那个,问我工作着(辛苦)吗”,生活气息十分浓郁,一下子就将读者拉入了南方场域之中。

在辽阔的文学花园里,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写作优势。诗歌长于抒发性情,小说长于虚构故事,戏剧长于情景演绎,散文长于写人记事。岑叶明的回忆性系列散文,充分发挥了散文写人记事的功能,对青年写作者有一定借鉴意义。在现实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回到故乡的田野,回到童年的水塘,那些尘封在时光深处的记忆,那些曾经被我们忽略的人事物,也许会在某一瞬间复活并向你招手。这是一场时光回溯之旅,也是一场人生考古,而考古现场离我们大约二三十年光景,我们完全有能力将其复原。过去的日子,或美好或残缺,或快乐或痛苦,但它们落到纸上、形成文字之时,无论爱与恨都能达成和解,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钓鱼比赛》中的时代影子与游离的灵魂

□ 刘娇

广西作家肖肖的小说集《钓鱼比赛》,以其深邃的洞察力与细腻的文笔,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生动的时光画卷及惟妙惟肖的众生百态相。其中,“马德”这一虚构角色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是肖肖引领读者深入其笔下生猛、鲜活的小说世界的重要媒介。“马德”也宛如作品中一个恒定的坐标,将时代变化与城镇迁徙、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微妙联系连接在一起,读者得以从中窥见作者对于故乡的深厚情感,及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镇和普通百姓的真实面貌。

肖肖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小说集《钓鱼比赛》中也可见大量的时代印记,小说中的“盐街”“水镇”等地所展现的正是典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城镇面貌。如小说中的“盐街”：“这几年,盐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总想着往外跑。但是,盐街上的楼房却与日俱增,房子空荡荡的,没人住,家家大门上挂着大锈锁。”小说中的“这几年”指向的是社会急速发展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年轻人纷纷外出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留下的不仅是空置的新旧房屋,还有孤独的老人和孩童。这一变化引发的不仅是空间的转换与迁徙,还有不同代际的小镇居民对于未来的迷茫与思索。肖肖在“盐街”或“水镇”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往往是少年,因为少年的眼光是最为锐利和真诚的,可以揭破成人虚与委蛇的客套和假象。例如《魔法师》中的少年,他渴望能够借助“魔法”快速长大,但是眼前从外地来小镇表演的“魔法师”,不过是一个身不由己、自己也想逃避成人世界的“骗子”;《愤怒的西瓜》中的少年,在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曲中幻想自己是一名“脚下生风”且能“行侠仗义”的英雄,但现实中却被人欺负,且无法翻身……这些故事并无太多复杂的逻辑,甚至可以说故事线单纯清晰,但其中却又蕴藏着一种莫名的荒诞和伤感,这些少年在小镇的急速变化中,宛若掉入了时光的缝隙无处可逃,只能在影视剧中寻求安慰,安置幻想。那些成长中充沛的荷尔蒙与少年时代独有的激烈情愫无法安置与投放,随之诱发的是一种令人迷惘心碎的孤独。少年们向往的成人世界看似充满力量和机遇,实则却充斥着混乱和凶险,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打破少年

们的幻想。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小镇少年成长的寓言,更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在时代巨变中滑向困惑、不安与迷茫的细腻侧写。

如果说,上述小说中“少年”的形象宛如时代和小镇的幽灵,那么在这本小说集中,肖肖还塑造了一个更鲜明具体的“幽灵”的人物形象,或言“游荡者”更为贴切,即“马德”。在肖肖笔下,“马德”是一个钓鱼爱好者,但他钓鱼并不是为了“钓”,反而更类似于一种对现实的无声反抗,有人问他钓鱼的意义,他反驳道:“你们问得好,钓鱼有什么意思呢?说实话,我也还没想明白,就像人家问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赚钱有什么意思呢?结婚有什么意思呢?这没几个人能说得上,说得上也不见得说得好说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马德”还是一位幻想自己有一位深情动人的情人“丽丽”的旅行者,同时也是一位新婚在即却渴望逃避的年轻人,甚至还在小说中化身过一条狗,引领自己失婚的主人发现了父亲的死亡事件……在肖肖笔下,无论是人还是狗,“马德”正是这样一个“游荡者”式的主人公形象不断出现在小说中,肖肖借助“马德”将历史记忆与个人情愫种种元素糅杂混合,展开新的观察视角。这种糅杂混合的“游荡者”的眼光,同时也把“马德”的矛盾与痛苦,孱弱与无助展露无遗,与现实相互指涉,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动态、复杂的荒诞性。“马德”其实正是那些“盐街”“水镇”的“幽灵少年”长大后的真实面貌,他生命上的种种经历,正是时代变幻在普通人身上刻下的真实纹理。这些纹理所刻录的不止是个体生命的卑微存在,还有他们身上暗藏的哑暗却仍旧熊熊燃烧的靈魂之火,一代人与历史之间的微妙联系,就这样于“马德”身上昭然若揭。

肖肖在小说集《钓鱼比赛》中所塑造的少年也好,“马德”也好,不管他们拥有怎样的身份,都有着一种对于自我和真相不懈追求的执着精神。作者借助他们的故事,通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时代画卷,让读者得以见证普通人是如何在命运与时代的浪潮起伏中找寻自己的位置。作者独立而自省,用创作者的自觉,成了浮躁变幻的大时代中,一位沉静犀利的“凝视者”。